

四川成都后蜀广政十三年袁氏解伏连石刻的初步研究

白 彬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）

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有道教解除伏连石刻一件，时代为后蜀广政十三年（950），讲述后蜀杨璟塘妻袁氏患“心气痛”，久治不愈，后经术士占卜，认为系高氏、吴氏、高氏三个女鬼“伏连缠绕”所致，故请道士“行符设醮，书名送水府，取策驱使”。类似的石刻在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地区都还是第一次发现，对研究唐末五代时期成都地区的道教活动情况有重要价值。

本文通过隶定文字、对的部分关键性词汇和术语（如“太上”、“河伯水府”、“卜决”、“伏连”、“行符设醮”、“书名送水府”等）进行考释，并联系有关道书文献对符策的含义及整个石刻的性质、伏连石刻的用法、所属道派、渊源和流变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。笔者认为，该石刻应系五代时期道士为生者袁氏举行断除伏连醮仪之遗存。“伏连”又称“复连”、“复注”、“注复”、“重复”，乃早期道教在人鬼关系问题上的一种宗教性解释，在《太上济度章赦》、《太上宣慈助化章》、《云笈七签》、《上清天心正法》、《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》等唐宋道书文献中都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。“伏连”之说最初为天师道所独有，在陕西、河南、甘肃等地的东汉、魏晋十六国墓葬中有不少这方面的遗存发现和出土，后为灵宝、上清等道派所吸收。袁氏解伏连石刻，应为如书女鬼姓名送河伯水府、命女鬼速去千里、重视符策的使用等，部分保存了早期天师道的特点。将久治不愈的心痛病之类非传染性疾亦归结为前亡女鬼伏连所致，在考古出土实物材料中是不多见的。尽管出土情况和伴出器物不详，但联系道书文献记载的情况看，推测该石刻应系出自患者居室附近或发生伏连处，出自墓葬的可能性不大。考古材料带道教符策者，最早见于东汉，南朝时有发现，唐代无闻，宋明稍多，五代仅两件而以

袁氏解伏连石刻年代为早，其画法风格与大宝五年（962）马氏二十四娘地券不同，与道书文献所载诸断伏连符画法亦完全不类，而与四川自贡南宋神霄派之“太上断除伏连碑”碑额所刻符篆一定的相似之处，表明袁氏伏连石刻与神霄派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晚唐五代以前，解除伏连的方法主要是上章；此后则以行符设醮为主，从一个侧面显示晚唐五代时期，道教的活动方式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。